

引用与追摹:朝鲜汉文散文接受苏轼诗文研究

曹春茹, 赵腾飞

(曲阜师范大学 文学院, 山东 曲阜 273165)

摘要:作为宋代文化巨擘,苏轼的声名与部分诗文早在他四十岁前便传入朝鲜半岛并广受关注。其众多脍炙人口的诗文在高丽、朝鲜两朝的汉文散文中被持续评论、引用、仿作与重构。朝鲜文人推崇“苏轼之才,远大之器”,认为“无出坡翁之右”者,因而广泛效仿其创作:在汉文散文中引用苏轼诗歌以见景咏怀、因事抒情、支撑观点;追摹苏轼的各类散文,通篇模仿或以相同题目再创作,《赤壁赋》尤受青睐。苏轼诗文不仅丰富了朝鲜汉文散文的文本,加速了其发展与成熟,也提升了这些作品的中国文化内涵与哲学深度,使其更具典雅性、理趣性与思辨性。此外,苏轼诗文在朝鲜政治、教育、哲学等多个领域广泛传播,影响深远,进一步巩固了苏轼在东亚汉文化圈的地位,并推动了其诗文的域外经典化进程。

关键词:朝鲜汉文散文;苏轼诗文;引用;追摹;接受

中图分类号: I31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217(2026)01-0059-11

收稿日期: 2025-11-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1FWWA001);朝鲜半岛古代宋诗接受研究。

作者简介: 曹春茹(1974-),女,吉林长春人,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

赵腾飞(1992-),男,山东曲阜人,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作为宋代文化巨擘的苏轼,其声名与部分诗文早在其四十岁(1076年)前便经使节往来与书籍贸易传入高丽,引起朝鲜半岛文人的高度关注。此后,苏轼作品以多种方式持续东传,贯穿高丽至朝鲜朝,广泛渗透于文学创作、治国理政、培养人才、教育科举之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苏轼众多脍炙人口的诗文在高丽、朝鲜两朝汉文散文中被持续评论、引用、仿作与重构。这一过程契合经典化理论中所强调的“价值重估”与“文化接纳”机制:即外来文本经由对象国文化权威的持续阐释、教育体制的认可及创作实践的纳入,逐步获得典范地位。朝鲜文人不仅藉此丰富了本土散文的审美维度与哲学内涵,更在跨民族诠释与接受中使苏轼作品从“中国杰作”成为“东亚经典”,实现了域外经典化。

苏轼其人其诗文在朝鲜的影响这一选题广受中国和韩国学者的关注,也有不少相关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主要研究朝鲜某位文人的创作对苏轼诗文的接受、苏轼经典诗词对朝鲜某一体或某位文人的影响,如曹春茹《朝鲜诗人申纬对苏轼及其诗歌的接受》^①、冉驰《朝鲜诗人南羲采对苏轼诗歌的审美批评》^②、李倩《古代朝鲜辞赋对苏轼〈赤壁赋〉的接受研究》^③,也有少数综述或综合类的研究,如陈庆《当代韩国学者论朝鲜时代的苏轼传播与接受》^④、马金科《苏轼诗祸对高丽、朝鲜朝文坛的影响》^⑤。本文则与现有研究不同,主要运用接受、影响、经典化等理论,专门探讨朝鲜汉文散文对苏轼诗文作品的接受,并总结苏轼诗文之于朝鲜汉文散文的重要作用与意义。此前未见同类研究成果。

一、“无出坡翁之右”:朝鲜文人对苏轼评价定位、学习效仿概述

在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域外传播史上,能够如苏轼一般深入影响朝鲜半岛文坛面貌与审美范式者,屈指

①曹春茹:《朝鲜诗人申纬对苏轼及其诗歌的接受》,《齐鲁学刊》2013年第6期。

②冉驰:《朝鲜诗人南羲采对苏轼诗歌的审美批评》,《地方文化研究辑刊》2016年第1辑。

③李倩:《古代朝鲜辞赋对苏轼〈赤壁赋〉的接受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延边大学中文系,2019年。

④陈庆:《当代韩国学者论朝鲜时代的苏轼传播与接受》,《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⑤马金科:《苏轼诗祸对高丽、朝鲜朝文坛的影响》,《外国文学研究》2025年第4期。

可数。苏轼不仅以其文学成就,更以其整体性的文化人格与哲学精神,持续影响着高丽至朝鲜时代的文人创作与批评传统,其大家地位在朝鲜汉文学史上不容置疑。

(一)评价、赞颂与定位

高丽、朝鲜朝文人和批评家对苏轼的创作与人格有诸多评价和赞颂。如朝鲜朝前期致力于学苏的金安国(1478—1543)《次副使工科左给事中薛廷宠东坡驿韵》说东坡的创作:“波澜笔下泻天河,海内文章数老坡。英爽久知归碧落,芳名犹喜寄林阿。”^①洪暹(1504—1585)《苏子瞻》诗云:“惊世高才不自珍,刚棱那避众人嗔。箴规直触龙鳞数,吞吐曾经虎口频。海内声名身万里,毫端造化力千钧。若教富贵终安稳,未必词锋挟鬼神。”^②这些诗歌充分肯定了苏轼的成就和文学史地位。大部分朝鲜文人认为多种思想融合使得苏轼的精神世界更广阔、创作更丰富、生活更多彩。如俞荣(1607—1664)《东坡先生写真赞》曰:

萧爽于其表者,老柏长松;挺动于其中者,活虎生龙。踔厉宇宙兮一横一纵,贯穿儒释兮游刃迎锋。达则金闺玉署,穷则瘴海蛮乡。襟盈赤壁之风月,鬓染朱厓之雪霜。是非得丧,悲欢荣悴,珠霏玉屑,迸散咳唾。俨乎若高拱骚坛,命仆黄秦。飘然若超出物外,醉挟飞仙。惟其不以生而存,不以死而亡者。盖有掩之而不忽,愈久而弥彰焉,百世之下或将精会而神交。眉山不拥,锦水不绝兮,又何待裴令颊上之三毛。^③

在此,作者从不同角度赞美了苏轼,认为儒释思想让苏轼在宦海沉浮中游刃有余,而道家精神让苏轼超然物外、跨越了生死,苏轼的精魂永远不朽,即使百代以后,仍然可以与之神交。稍后的南龙翼(1628—1692)在《壶谷诗评》中说:“宋名家中,王半山精而刻,梅都官妙而枯,苏东坡大而饒,黄山谷奇而狭……最优者陈简斋(与义)乎?然大家则无出坡翁之右。”^④“大而饒”“无出坡翁之右”的观点承前启后,是对东坡创作特色及其在宋代文坛的首席地位的精准概括。苏轼亦受到朝鲜官方和上层统治者的关注,《成宗实录》载:“昔苏轼中制科,英宗即欲便授知制诰。其时宰相曰:‘苏轼之才,远大之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用之,然后取而用之,则人人无复异辞矣。今骤而用之,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成宗十六年五月九日)^⑤这段话出自《宋史·苏轼传》,原文引宰相韩琦语。^⑥朝鲜文臣赞同这一说法,强化了苏轼为“远大之器”的观点。《明宗实录》载:“人君之崇尚文辞,虽非为治之急务,而取其有补于治道者,犹之可也,若专尚词华,使一世之习,归于浮薄,则其弊不可胜言。人君真知人才,如宋神宗之于司马光、苏轼,则自能奋发琢磨,蔚然为一代之宗匠。”(明宗十年闰十一月二十四日)^⑦“远大之器”“一代之宗匠”是朝鲜君臣对苏轼的定位,是对苏轼文学才华和政治潜能的双重肯定。

(二)学习效仿

朝鲜君臣及文人对苏轼定位极高,诗文创作学苏轼者极多。崔滋(1188—1260)《补闲集》说:“近世尚东坡,盖爱其气韵豪迈、意深言富,用事恢博,庶几效得其体也。”^⑧“今观眉叟诗,或有七字五字从《东坡集》来。观文顺公诗,无四五字夺东坡语,其豪迈之气,富赡之体,直与东坡吻合。”^⑨从这两段议论可知,朝鲜文人学习苏轼始于高丽中期,当时著名的三位大家林椿(西河)、李仁老(眉叟)、李奎报(文顺公)创作均受苏轼影响。“苏轼对朝鲜古代汉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高丽朝中后期,‘每岁榜之后,人人以为今年又三十东坡出矣’,由此可知苏轼对于高丽朝后期文人影响之深。”^⑩此时的文学大家李穡(1328—1396)就多次表示

①[朝]金安国:《慕斋集》,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20辑,首尔:景仁文化社,1988年,第151页。

②[朝]洪暹:《忍斋集》,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32辑,首尔:景仁文化社,1989年,第302页。

③[朝]俞荣:《市南集》,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117辑,首尔:景仁文化社,1993年,第319页。

④蔡振楚编:《域外诗话珍本丛书》,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11册,第486页。

⑤[日]末松保和编:《成宗实录》卷179,《李朝实录》,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8年,第17册,第303页。

⑥[元]脱脱等:《宋史》卷三百三十八《苏轼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1册,第10802页。

⑦[日]末松保和编:《明宗实录》卷179,《李朝实录》,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1年,第26册,第62页。

⑧[朝]崔滋:《补闲集》上,赵钟业编:《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首尔:韩国大学社,1996年,第106页。

⑨[朝]崔滋:《补闲集》上,赵钟业编:《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第106页。

⑩崔雄权、李珍莹:《朝鲜古代首部官纂〈唐宋八家诗选〉考辨》,《东疆学刊》2025年第2期。

自己酷爱东坡诗,其《述怀》曰:“我爱东坡诗,豪气超尘寰。至今吟不休,朝来微破颜。”^①

朝鲜朝前期,大量文人有意学苏。徐居正“纵笔试学东坡仙。”(《即席,伏承和韵,巧速无比,不揆鄙拙,复步韵,录奉博笑》)^②“拟续东坡老居士”(《薄酒》)^③。接下来的几位著名文人金时习、李荇、金安老等的诗文创作也都得益于苏轼。李荇(1420—1488)《白帝庙》曰:“蜀山峨峨,蜀水洋洋。孰为遗臭,孰为流芳。聊慷慨而兴叹,续坡仙之短章。”^④朴性阳(1808—1890)说:“金西浦《漫笔》曰:‘本朝诗体不啻四五变。国初,承胜国之绪,纯学东坡,以迄于宣靖,惟容斋称大成焉。’”(《芸窗琐录》)^⑤朝鲜朝前期向中期过渡阶段,诗风由宗宋逐渐转变为学唐,朝鲜朝中期开始,整体诗风已经转为学唐。尽管如此,苏轼及其诗文在朝鲜诗坛的影响依然绵延不绝,有意学苏者大有人在,如李光胤、申钦等。申钦(1566—1628)是朝鲜朝中期文坛之翘楚,他对过去及当时的朝鲜文坛有清醒的认识,总结说:“丽朝及我朝,皆尚东坡,故丽朝大比,至有‘三十三东坡’之语。近年以来,稍稍不喜,为诗者皆学唐人,而揆其造诣则不过寿陵步尔,岂不闻‘诗到无人爱处工’之语耶?”(《晴窗软谈》)^⑥他看到了当时诗人们对宋诗的冷落,对苏轼也表现出“稍稍不喜”的态度,进而纷纷学唐,而他自己却没有忽视苏轼,许多诗文有明显的东坡风。和此前相比,朝鲜朝中期学苏的诗人的确有所减少。

到了朝鲜朝后期,受到清代宗宋学风的影响,朝鲜文坛对苏轼的接受与评价又掀起了新的高潮。此时学苏典型有申靖夏、丁若镛、申纬、黄玗等等。申靖夏(1681—1716)诗文创作都以东坡为范。赵龟命(1693—1737)《复题莱莢轩诗画帖》曰:“向者,平山申正甫,慕悦东坡,作文写字,一皆模画。于所居室,挂东坡像,戴东坡冠,手东坡集以对之。”^⑦丁若镛(1762—1836)也努力研习东坡诗文,在创作思想和形式上有明显体现。如其诗云:“流观北苑舟中画,细和东坡谪里诗。”(《晚春独坐》)^⑧朝鲜朝后期,学苏最为深入的莫过于申纬(1769—1845)。他说:“余所藏东坡文字,旧有《全集》、王注、施注、查注四种,又得覃溪补注及海外集二种。兹集之聚,殆无遗憾。喜而有述,凡四百四十首。”^⑨广泛收集各种版本的苏轼文集后,申纬十分欣慰,特为此作诗140首。黄玗(1855—1910),是朝鲜朝最后一位有意学习苏轼的文人。“黄玗能诗,尚气节之士,平日极推尊东坡。”(《答崔命喜》)^⑩黄玗于1910年去世,朝鲜王朝也结束于这一年。至此,朝鲜半岛古代文学对苏轼的接受也落下了帷幕。

二、“东坡诗文俱神境”:朝鲜汉文散文对苏轼诗文的引用与追摹

苏轼诗文题材广泛,风格多样,名篇名句颇多。申钦《晴窗软谈》云:“东坡诗文俱神境也。”^⑪因此,引苏诗名句、追摹苏轼散文在朝鲜汉文散文创作中非常多见。

(一)对苏轼诗歌的引用

朝鲜文人经常引东坡诗歌丰富自己散文的思想内容、题材或创作技巧,苏诗经典名句或名典成为这些散文的点睛之笔。

1. 见景咏怀

①[朝]李穡:《牧隐稿》第2册,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4辑,首尔:景仁文化社,1990年,第476页。

②[朝]徐居正:《四佳集》第2册,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11辑,首尔:景仁文化社,1988年,第167页。

③[朝]徐居正:《四佳集》第2册,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11辑,第167页。

④[朝]李荇:《容斋集》,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20辑,首尔:景仁文化社,1988年,第578页。

⑤[朝]朴性阳:《芸窗琐录》,韩国古典翻译院编:《韩国文集丛刊续集》第129辑,首尔:景仁文化社,2009年,第333页。

⑥[朝]申钦:《象村稿》第2册,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72辑,首尔:景仁文化社,1991年,第335页。

⑦[朝]赵龟命:《东溪集》,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215辑,首尔:景仁文化社,2002年,第128页。

⑧[朝]丁若镛:《与犹堂全书》第1册,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281辑,首尔:景仁文化社,2002年,第84页。

⑨[朝]申纬:《警修堂全稿》,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291辑,首尔:景仁文化社,2002年,第159页。

⑩[朝]田愚:《艮斋集》第5册,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336辑,首尔:景仁文化社,2004年,第60页。

⑪[朝]申钦:《象村稿》第2册,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72辑,首尔:景仁文化社,1991年,第335页。

在游山玩水中借景抒情咏怀、或吟咏前人相关诗句是东亚文人的共同喜好，如杜甫在泰山写下了千古名篇《望岳》，后历代文人在游览泰山时总会不自觉地吟出该诗。朝鲜的古代诗人也十分喜欢这种带有诗情的游赏，在现存朝鲜文人文集中，有不少记游类文章引用了苏诗名句。如洪敬谟(1774—1851)《遵海胜游记》巧妙地以苏轼诗句作结：

自津至苏江为一由旬之间，而沃野散店、桑麻甚盛。……饭于宣威堂，陪从叔出西门，门前即海之内洋，水伯已具舳舻建旗鼓而待之。相与登船，沿洄上下。时天无纤翳，月华倒映。海无点风，锦波安流。东坡诗“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之句，正为今日道也。^①

在月朗无云、风平浪静的夜晚，洪敬谟陪从叔船游内海。二人无比放松，心情舒畅。此情此景让作者想起苏轼从海南登船北上之夜。1100年，谪居海南三年的苏轼被赦免，六月二十日夜，他登船北上。被赦的喜悦加上即将见到好友秦观，让苏轼觉得眼前的夜色十分美好，于是吟出“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六月二十日夜渡海》)的千古佳句。当洪敬谟也遇到了这样的夜晚，他认为用这句诗来描绘最为恰当。因此，这联诗既是苏轼登海时的情景与心情的写照，也成了洪敬谟游海之夜的关键所在。

赵德邻(1658—1737)的《关东续录》中有一段关于妙香山的景物描写：

此为万瀑洞上流，潭名为火龙，为黑龙，为青龙，以深也；为船潭，为龟潭，为琵琶潭，以形也；曰真珠潭者，以自高泻下，涛波错落如散珠也；……惟杨蓬莱所书“蓬莱枫岳，元化洞天”八大字，刻在万瀑、圆通两洞交流之间，而龙蛇蟠屈，势若飞动。余因吟东坡诗“帝遣银河一派垂，古来惟有谪仙词。飞流溅沫知多少，不为徐凝洗恶诗。”况有不得为徐凝者耶？余未尝一题姓字，游僧强为之，题一处，不知后来者之评以为如何也？^②

赵德邻见到巨石、飞瀑、深潭，想起古人关于瀑布的诗句。此处所引东坡诗为《戏徐凝瀑布诗》，该诗分别对李白的《望庐山瀑布》和徐凝的《庐山瀑布》进行了评价，褒李而贬徐。赵德邻熟悉这两首诗，也赞同苏轼的评价。面对这样的壮丽景色，他也有创作欲望，可又担心被后人耻笑，因为徐凝都得到了苏轼的差评。不过在游僧的强烈要求下，赵德邻还是留下了诗句。

朴趾源(1737—1805)在华期间饱览中国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为中国的大好河山所倾倒，在《书李邦翼事》中他细摹了扬子江中金山的自然及人文景致：

寺前石假山高可百丈，又砌石周五里环，建二层阁，下层则儒生数千居住，鬻书为业，上层歌吹熏天。渔钓之人，携竿列坐。……又有钟磬十四，木人应时自击，一钟先鸣，众钟次第皆鸣。按金山在扬子江心，其胜概为天下第一。……寺曰“龙游”，阁曰“毘罗”。毘罗之南，为妙高台，上故有楞伽室，宋眉山苏公尝书经于此。北曰“善财楼大悲阁”，吞海、留云二亭。据山之巔，登而四望，江波渺然，台殿皆在其下，令人神爽飞越。东坡诗“金山栖阁何耽耽，撞钟伐鼓闻淮南”者是也。^③

当朴趾源遍览了金山景致，目睹了金山亭台楼观的庄严雄伟，耳闻了金山寺钟鼓的嘹亮清远，顿时心生感慨，于是登顶而远眺时，想到了苏轼的“金山楼观何耽耽，撞钟击鼓闻淮南”。此句出自苏轼的《自金山放船至焦山》，极言金山景色的壮观并暗示了此地的香火之盛。

这几位朝鲜文人都在游览和赏景中联想起苏轼的诗文，为自己的游赏增添了诗情画意。苏轼的诗句成为他们见景咏怀、于游览中寻求雅兴和文化满足的载体。

2. 因事抒情

在遇到喜怒哀乐各种事情的时候，苏轼诗歌也经常被朝鲜文人用来表达不同的感情，尤其是父子情深、兄弟相亲的感情。

1728年，南有容(1698—1773)30岁，其兄长去世，年仅32岁。南有容悲痛不已，深情写下了六千字的《祭伯氏文》，祭文最后说：

①[朝]洪敬谟：《冠岩全书》第1册，韩国古典翻译院编：《韩国文集丛刊续集》第113辑，2009年，第488页。

②[朝]赵德邻：《玉川集》，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175辑，首尔：景仁文化社，1996年，第241页。

③[朝]朴趾源：《燕岩集》，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252辑，首尔：景仁文化社，2000年，第105-106页。

恸矣恸矣，山石可磨而穷也，此冤不可穷也；……心中所欲言，百不举一。惟以苏长公诗中“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之句，敬诵于枢前耳。公其闻乎无闻乎？悠悠此世，乐少哀多。公去奚悲？我留奚乐？满腹皆悲，堕地皆泪。伏惟尊灵，哀我歆我。尚享。^①

从这段真挚的文字可见南有容对兄长之死的无限悲痛，虽然已经在祭文中表达得淋漓尽致，但他觉得还不够，于是在苏诗中找到了最能表达此刻心情的诗句，“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并在哥哥灵前痛哭吟诵。此句出自苏轼的《狱中寄子由二首》（其一）。1079年，“乌台诗案”后，苏轼被捕，他自以为罪将不赦，于是作《狱中寄子由二首》，表达了兄弟间的深情。我们今生是兄弟，来生续情缘，生生世世永远是兄弟。这一联诗真诚感人，表达了南有容与苏轼共同的情感和愿望。

申绰（1760—1828）曾为去世的父亲写过行状，其中有父亲艰苦读书和教诲子弟的情节：

子弟四五人，常围绕讲习于其侧。公亦自课书，夜无灯烛，帖书筹于纸窗，照星月下筹。诵今文《尚书》，或《易·系》《雅颂》。东坡诗曰：“宛丘先生长如丘，宛丘学舍小如舟。常时低头诵经史，忽然欠伸屋打头。”即事有感。自号宛丘生。（《先府君事状》）^②

申绰描绘了父亲生前的情况，生活清苦，却坚持读书学习，还在自家的斗室设立讲席，教诲四五子弟。由此，作者想到了苏轼的《戏子由》中描述弟弟苏辙（子由）做学官的情景。1071年，苏轼在杭州任上，当时，苏辙任陈州（亦称“宛丘”）学官（州学教授）。此职务位低薪薄，所以学舍低矮简陋，而苏辙却能够安贫乐道。故苏轼作此诗以戏之，说是戏之，实则赞美。申绰发现父亲生前读书教人的情景正和苏辙经历相似，自然想到了苏轼的这首戏谑之诗，并借此表达对父亲的赞叹与怀念之情。

金允植（1839—1922）特别崇拜苏轼，既欣赏苏轼的诗歌，也敬佩苏轼与弟弟苏辙的深厚感情，曾经收集了苏轼苏辙往来唱和的诗歌数百篇，结集为《琼雷联璧集》，并为该集作序曰：

然二公之在谪也，邮筒相续，未见因戒而废诗，盖恋国怀家忧患伤离之情，非诗无以发之也。郑茂亭承宣及其弟葵园洗马，皆名高艺林，为时人所推。与苏氏伯仲相似。兄弟俱不能安于朝，而一时分窜亦相似。两岛相望，隔以大海，每有船便，辄以诗相和。东坡诗所云“纵道琼雷云海阻，圣恩犹许遥相望”者。其情事又何其相似也。于是辑录其往复诗篇凡数百首，名之曰《琼雷联璧集》。（《琼雷联璧集序》）^③

在朝鲜，有学识的兄弟经常被比为苏轼和苏辙，如金富弼、金富辙连名字也取法苏氏兄弟。郑茂亭、郑葵园兄弟均为时人所推的才子，分别被贬谪在金岛和济州，与当年的苏轼和苏辙一样，隔海相望，“每有船便，辄以诗相和”。正如苏轼《寄子由》所言：“纵道琼雷云海阻，圣恩犹许遥相望。”“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到海南儋州，苏辙被贬到广东雷州，雷州与儋州隔海（琼州海峡）相望，兄弟二人靠邮寄书信诗文往来，在艰苦的异乡抒写了感人的手足情。于是诗人金允植将郑氏兄弟与苏氏兄弟相比，用苏轼诗句概括两对兄弟的共同遭遇和感慨。

3. 支撑观点

朝鲜诗人引用苏轼诗句更多的情况是用来做论据，支撑某一观点，或阐述某种道理，增强说服力与权威性，深化主题，提高思想深度，使论点更难以被驳斥。曹好益（1545—1609）的《答任卓尔问目》有一段对“栳”的释义：

冠者不栳。注曰：“不为饰”。李先生，去冠梳。释曰：“疑首饰之类。”东坡诗曰：“溪女笑时银栳低”云云。屹虑或栳是首饰。故去之于亲癢之中也耶。宋人诗，有云“鬓半髲犀梳偃之”句。于潜人蓬沓。一名银栳。则梳与栳之为首饰。信矣。然皆妇人之首饰也。^④

作者认为“栳”的一个义项为“饰”，为证明这个解释的正确性，他引用了苏轼《于潜令刁同年野翁亭》中的“溪女笑时银栳低。”（整联为“山人醉后铁冠落，溪女笑时银栳低。”）根据诗意可以肯定，银栳为溪女的首

①[朝]南有容：《雷洲集》第1册，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217辑，首尔：景仁文化社，1998年，第372页。

②[朝]申绰：《石泉遗稿》，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279辑，首尔：景仁文化社，2001年，第490页。

③[朝]金允植：《云养集》，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328辑，首尔：景仁文化社，2004年，第399页。

④[朝]曹好益：《芝山集》，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55辑，首尔：景仁文化社，1990年，第484页。

饰。申钦曾创作《请勿递宪府笏》上疏朝鲜国王，劝谏其不要降职、降罪宪府，其中有一段：“牵裾者近于不恭，焚诏者涉于悖妄，而前史以为美谈，先儒不以为非者。良以人君不如是包容，则无以来直言而作士气也。苏轼有言曰：‘欲求死节之臣，当于犯颜敢谏中求之。’”^①作者先用大臣辛毗拉曹丕衣襟劝谏和颜真卿焚烧假圣旨两个典故来褒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和担当，认为人君只有包容，才能得到直言之士。危急时为气节和大义去死的忠臣，只能出现在犯上敢谏的臣子中。而最有力的论据则是苏轼《上神宗皇帝书》中的名句，引文与原文稍有出入，原文为“平居必常有忘躯犯颜之士，则临难庶几有徇义守死之臣。”^②丁若镛的《雅言觉非》中有对“汤饼”的释义：

汤饼者，面煮之物也。今人以元朝所食白饼之汤熟者当之，非矣。束皙云：“馒头宜春，薄壮宜夏，起溲宜秋，汤饼宜冬。”……苏轼诗云：“汤饼一杯银线乱。”既有银线则条面之类也。《唐书明皇后传》云：“阿忠脱衣易斗面，为生日汤饼。”《青箱杂记》云：“凡以面煮之，皆曰‘汤饼’。”^③

丁若镛认为时人对汤饼的解释有误，于是引经据典来更正，其中有苏轼的“汤饼一杯银线乱”诗句，该句出自《过土山寨》：“南风日日纵篙撑，时喜北风将我行。汤饼一杯银线乱，菱蒿如箸玉簪横。”^④这是很重要的证据，丁若镛以此证明汤饼就是条面。

奇宇万(1846—1916)《书锦江五贤契案后》要表达山水对造就人才的作用，开篇即引用了苏轼的诗句：

东坡诗曰：“呼吸湖光饮山渌，佣奴贩夫皆冰玉。”湖光山渌，能令佣贩冰玉。矧乎士君子山水助发，蕴之为德行，发之为文章。始于山水而终于山水，百世增美，盖人与地匹休者然尔。锦江，南土名湖，湖精之所毓。奇伟逸宕之才，往往产焉。^⑤

苏轼的《书林逋诗后》的前两联曰：“吴侬生长湖山曲，呼吸湖光饮山渌。不论世外隐君子，佣儿贩妇皆冰玉。”奇宇万引了其中2、4两句，用来说明山水对君子文章和德行的助力作用。接着作者转入对锦江五贤的赞美，突出了此地人杰地灵的特色。

以上几例中，诗人都是借助苏轼诗句来强化某种观点，但也有不同的情况。如张维(1587—1638)《论天覆地载》云：“古人言地居天内，天大而地小。表里皆水，地载水上，随气升降，故有地有四游之说。东坡诗亦云‘乾坤浮水水浮空’。余独不谓然，天职覆地职载，日月星辰皆系于天，山岳海渌皆着于地。故中庸曰‘振河海而不泄’。”^⑥在这里张维反对古人对天和地的职能、关系的观点，其中也包括了苏轼的“乾坤浮水水浮空”的说法。如此看来，朝鲜诗人对苏轼诗歌也不是完全信服，也有质疑的时候，这正体现了他们辩证的接受态度。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这是最经典的深入浅出表达哲理的千古名句，也是朝鲜诗人引用频率最高的一联。如以下各例：

及至内山，全体呈露，便觉气象浅薄。坡翁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夫内外殊观，庐山之所不免也，又何足为兹山之累耶。(《南游录》)^⑦

行行数十里，登柳头院岭。望见层壁迭嶂，面面霜林，玲珑红锦。比向日之观，顿觉奇壮。乃知苏长公所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非虚语也。(《游金乌山记》)^⑧

西访金禄休，得闻兹山甚悉。而益知其所不见者，胜于所见，愀然有失。但诵古人“不识庐山真

①[朝]申钦：《象村稿》第2册，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72辑，首尔：景仁文化社，1991年，第164页。

②[宋]苏轼：《东坡文钞》上册，高海夫编：《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4627页。

③[朝]丁若镛：《与犹堂全书》第1册，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281辑，第529页。

④关于此诗作者，亦有黄庭坚之说。清人王文诰的《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769页)中收录了该诗，并注曰：“慎按，亦见《山谷集》十九卷中，今改正。”

⑤[朝]奇宇万：《松沙集》第1册，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345辑，首尔：景仁文化社，2005年，第528页。

⑥[朝]张维：《溪谷集》，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92辑，首尔：景仁文化社，1992年，第570页。

⑦李夏坤：《头陀草》《洲斋集》第1册，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191辑，首尔：景仁文化社，1997年，第540页。

⑧[朝]宋秉璇：《洲斋集》第1册，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329辑，首尔：景仁文化社，2004年，第319页。

面目”之语而已。((《白岩山记》))^①

而自坐在里许,人自周觉尔。苏子瞻诗曰:“不见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天下之理,正如是也。((《赵苞嵇绍事往复后说》))^②

诗人们都在写奇秀、奇壮、雄胜、佳丽的山林风景,也都借助苏诗表达了理趣。真正的认知不仅在于深入地沉浸和体验,更在于有能力适时地抽离与反思,在“入乎其内”和“出乎其外”之间转换,从而无限接近那复杂的“真面目”。且“天下之理,正如是也”。

(二)对苏轼散文的追摹

高丽中期林椿(生卒不详)在《与眉叟论东坡文书》中说:“仆观近世,东坡之文大行于时,学者谁不伏膺呻吟?”^③“东坡之文”指广义的散文,包括其散体古文和赋。“大行于时”说明苏轼散文在当时流传广泛,文人们已经开始接受了。他们在汉文散文创作中通过各种形式学习、追摹苏轼的各类散文,或者通篇模仿,或者以相同题目创作,或者反用其题目,或者引用其中的名句或观点等等。

文人申国宾(1724—1799)去世后,其门人郭孟键为其作祭文,开篇即引用苏轼的《祭欧阳文忠公文》:“呜乎!昔东坡祭欧阳公文曰:‘上以为天下恻,而下以哭吾私。’信乎东坡之善哭欧公也。呜乎!先生以英迈之姿,拔乎流俗之中,而夙负高名,早成文学,标致俊雅……呜乎!今之哭先生者,亦先为士林之恻而后吾私也。伏惟尊灵,陟降在上,鉴我至诚。”^④郭孟键在痛哭老师时,深刻地理解了当年苏轼痛哭欧阳修时的心境。苏轼首先为天下少了一位文化巨人而悲恻,然后表达个人之悲恻。作者与苏轼一样,并非仅仅表达一己之悲,而是将这种悲痛置于一个更宏大、更崇高的框架内,使得私人的崇敬、不舍、悲恻之情感到了升华。

《喜雨亭记》是苏轼记类散文的代表作之一,其创作的构思立意远超普通亭台记。文章从为亭命名“喜雨”这一行为切入,描绘了久旱得雨、官民同庆的生动场景,将一次自然现象转化为蕴含丰富儒家政治哲学的经典文本。在此,“喜雨”不仅是一种自然福祉,更成为一个重要的符号象征,体现了苏轼作为士大夫“重农爱民”的根本思想,以及“与民同乐”、德政感天的政治理想。朝鲜文人有感于苏轼的爱民情怀与政治理想,也追摹苏轼的这篇文章。

朝鲜卞季良(1369—1430)的《喜雨亭记》^⑤直接受到苏轼的影响,在语句、主题、结构以及“民本”“天人感应”的精神内核上都有苏文影响之痕迹。如苏文有“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则以名物,示不忘也。”卞文有“赐亭名曰‘喜雨’。……喜雨而名之斯亭,所以感天赐而不忘也。”苏文有“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卞文有“沐浴膏泽者,虽禽兽草木之微,岂非荣幸也哉?”苏文是“弥月不雨”后官吏民众之忧;卞文有“雨泽未洽”时君王之忧。从结构上看,两文都是“叙事—写景—议论—歌唱”的范式,构建了“忧旱—宴饮—逢雨”的戏剧性场景。而“雨”在两篇文章中都有象征意义,苏文中,雨是上天的恩泽,是官吏贤明、政治清明的自然回应,卞文中,雨是君王仁德的直接体现,是“圣心”感通上天的结果。苏文结尾将功劳归于虚无缥缈的“太空”,体现了其道家的超脱与哲思。卞文则将功劳归于“天公地媪”,并有“翛然出尘之想”,这一内容使得这篇文章也超越了纯粹的政治颂歌,向苏轼所展现的与自然宇宙合一的境界靠拢。通过以上对比可以清晰地看到,卞季良的《喜雨亭记》在核心主题、文章结构、关键场景和哲学思想上都与苏文关系紧密,是一篇追摹之作。

石之珩(1610—?)也有一篇《喜雨亭记》,该文开篇即提及苏轼的《喜雨亭记》:“昔眉山苏长公,通判凤翔府之明年,为亭于公堂之背。时天旱,亭比成而雨,遂扁以‘喜雨’,示不忘也。”^⑥两篇《喜雨亭记》构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学对话,展现出清晰的结构传承与主题呼应。石文受苏文影响,构建了“引苏典—述

①[朝]宋秉璇:《渊斋集》第1册,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329辑,第360页。

②[朝]梁得中:《德村集》,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180辑,首尔:景仁文化社,1996年,第76页。

③[朝]林椿:《西河集》,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1辑,首尔:景仁文化社,1988年,第242页。

④[朝]申国宾:《太乙庵集》,韩国古典翻译院编:《韩国文集丛刊续集》第88辑,首尔:景仁文化社,2008年,第164页。

⑤[朝]卞季良:《春亭集》,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8辑,首尔:景仁文化社,1990年,第71-72页。

⑥[朝]石之珩:《寿岷集》,韩国古典翻译院编:《韩国文集丛刊续集》第31辑,首尔:景仁文化社,2007年,第367页。

旱情一记筑堂一雨至一命名议论”的结构框架。在场景描写上,石文有“今年春大旱,至首夏犹不雨。民方陷于荐饥,耕耘之又失其候。阖四封之内,索然靡有生意。”此句与苏文的“弥月不雨,民方以为忧”遥相呼应。而苏文载:“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忧者以喜,病者以愈,而吾亭适成。”这部分在石文中亦有对应:“洎四月二十五日乘屋瓦讫,而大雨一日,后四日,又大雨三日。水搜沟洫,人出耒耜,五种怒生,四民欣悦,咸忘元旱之为酷。公喜而谓不佞曰:“吾堂既成,吾将择命令名。天幸惠吾民以雨,吾欲用揭吾堂,其可乎否?”可见,二者在结构和文本内容上高度契合,表现了明显的“接受—影响”关系。

苏轼的前后《赤壁赋》熔散文气韵与骈文声律于一炉,突破传统赋体形式,确立了宋代文赋的成熟范式。作品将宇宙观照、生命哲思与山水意境完美结合,开创了“情理景”交融的美学新境。二赋深刻展现了宋代士人“出入儒道、融摄佛理”的精神气象,因而被汉文化圈奉为经典,成为理解中国士人文化与宋代美学的核心文本。前后《赤壁赋》在朝鲜的广泛流布,其影响超越了单纯的文学借鉴,实现了从“文学实践”到“精神世界”的双重渗透。

黄廷彧(1532—1607)游览海州苏门山时曾应邀作《桂影堂记》:

每夜久月明,碧落千里之影,徘徊簷筛于松翠之间。而清风爽气,一时俱至,尽纳于轩窗几席之上。……昔东坡苏公有云:“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乃以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有耳目者得而遇之,则为声为色。各随其自然,此固与物无竞,与众共乐之心也。”可见其胸襟浩大,独出乎万物之表,岂不快活哉?^①

黄廷彧与友雅集,沉醉于清风明月之美,自然想起《前赤壁赋》中的名句,虽然引用时字句有些出入,但他领悟了苏轼“物各有主”“共适风月”的哲学思想,抒发了对东坡境界的向往,赞叹并为之共鸣。“胸襟浩大”,赞叹苏轼超脱了世俗物欲的羁绊。“独出乎万物之表”,言其精神境界凌驾于万物之上,获得了绝对的自由。他认为,苏轼的思想并非空洞的理论,而是一种可以践行、能够带来真实快乐的生活态度。他自己也通过这次雅集,融入了这一精神传统之中。最后的“岂不快活哉?”既是赞叹苏轼,也是表达自己此刻践行此道后获得的同等快活。苏轼名句的引入,使得《桂影堂记》在叙事写景的基础上升华,将文章的境界从具体的物象描绘提升至对人与外物、人与自然关系的哲理性思考,赋予了作品深厚的哲学意蕴和超然的审美格调。

洪敬谟曾与友人在《赤壁赋》中模拟了泛舟赤壁的情景:

壬子之秋七月既望,泛舟游于清流壁之下,拟苏仙之赤壁故事也。……少焉月已吐矣,呼舟而登。木落山清,江鸣石出。但见上下绀碧,混为一色。月亦为微云所掩……遂乃放舟中流,溯洄于练光绫罗之间。星河皎洁,树影婆娑。诸山云物,吞吐于縠纹之中。为镜中之相,相中之色。渔灯舟火,与月色上下。新秋雨过,江沱晚凉,于是薰炉炭呼酒鎗。客有善棹歌者,倚舷而唱。使僮人吹箫,助之以簫栗胡笳。声振林樾,鱼龙出听。更命荡桨,随波下上。水气腾空,积为缟素。吾所登之舟,正浮在太虚空蒙间,恍然如驭冷风游汗漫,浩浩乎、飘飘乎不可得而状焉,缓声歌《赤壁》之赋。(《泃江泛月记》)^②

同样的日期,同样的时辰,同样的月色,同样的江水,洪敬谟和友人在泃江泛游中感受了苏轼泛舟赤壁的美好情景。“木落山清,江鸣石出”,以简练笔触勾勒出清朗的秋夜意境,既呼应了苏轼“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的视觉经验,又通过“江鸣”二字强化了听觉感受,丰富了感官层次。在月色描写上,“月为微云所掩”的细节,较之苏赋中“月出于东山之上”的明朗,更添一层朦胧变幻之美,体现了朝鲜文人对自然微妙变化的细腻把握。最为精彩的是对“虚空”意境的营造:当水气腾空,舟浮太虚,作者“恍然如驭冷风游汗漫”的体验,既继承了苏轼“浩浩乎如冯虚御风”的超脱感,又融入了道家游仙的想象,将现实的游赏升华为精神的神游。此情此景中,大家缓声吟诵了《赤壁赋》。一次普通的月夜泛舟经历,朝鲜诗人体验到了东坡泛舟

①[朝]黄廷彧:《芝川集》,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41辑,首尔:景仁文化社,1989年,第465页。

②[朝]洪敬谟:《冠岩全书》第1册,韩国古典翻译院编:《韩国文集丛刊续集》第113辑,第488页。

赤壁的悠闲与喜悦,《涇江泛月记》也因此被创作出来。可以说,《赤壁赋》促成了朝鲜文人一次美好的精神享受,也成就了朝鲜一篇优秀的游记。

在朝鲜,文人们无数次复制赤壁泛舟的情景,追摹《赤壁赋》而成的散文数不胜数。题目中带“赤壁”的如金诚一(1538—1593)《游赤壁记》、赵根(1631—1680)《游赤壁记》、申维翰(1681—1752)《拟赤壁赋》、申锡愚(1805—1865)《涇江泛月赋 用赤壁赋韵》。也有反用其题的,如赵缵韩(1572—1631)《反赤壁赋》。此外,有些题目不带“赤壁”的也是追摹《赤壁赋》而作的散文,如李埈(1560—1635)《洛江泛月诗序》、李光庭(1674—1756)《龟台夜游记》等。可以说,《赤壁赋》既为朝鲜的游记、散文创作提供了范式,也重塑了朝鲜文人在山水审美、自然观照与生命哲学等维度的思想内涵。

三、“文章镜千古”:朝鲜汉文散文接受苏轼诗文的意义

自高丽中期至朝鲜朝,苏轼的诗文成为朝鲜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思想与文化资源,极大地丰富了朝鲜汉文散文的内涵与形式,促进了苏轼文学在东亚文学世界的经典化和千古不朽。如金履万(1683—1758)的《读东坡诗》所言:“公眼在后人,文章镜千古。”^① 朝鲜汉文散文接受苏轼诗文之意义和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丰赡了朝鲜汉文散文的文本,使其在内容、形式、风格、情感等方面多元化,加速了朝鲜汉文散文的发展与成熟

苏轼作品涵盖诗歌、奏章、政论、游记、书信、随笔、题跋、祭文、杂说等多种文体,题材广泛,风格多样,展现出极高的艺术成就与思想深度。其诗文中大量经典语句与段落历经时代淬炼,已成为东亚文学传统中不可忽视的经典资源。朝鲜汉文散文对苏轼诗文的引入与追摹,显著提升了其文本的丰富性与表现力,对其内容、形式、风格及情感表达等多个维度产生了深远影响,加速了该文体的成熟与深化。在内容层面,朝鲜文人广泛征引苏轼的诗文,或作为议论的依据,或充当描写的素材,或用于情感的抒发,极大丰富了散文的内容、题材,增强了思想厚度,同时吸纳了苏轼文学中的理性精神与人文关怀。在风格层面,由于苏轼本人创作兼收并蓄、不拘一格,其诗文既有豪放洒脱之气,亦具含蓄隽永之致,朝鲜汉文散文受其影响,也逐步呈现出多元交融的美学风貌,或气势恢宏,或婉转细腻,或理趣盎然,风格的多样化标志着朝鲜汉文散文艺术上的进步与成熟。在情感表达层面,苏轼诗文中那些关乎人情冷暖、离别思念、朋友赠答、寄情山水的经典语句,为朝鲜文人提供了高雅而恰当的抒情载体。他们借助这些诗句,更深刻、更真挚地表达赞美、不舍、思念等复杂情感,使文章的情感层次更为丰富,感染力与艺术价值得到显著提升。

因此,苏轼诗文不仅是朝鲜汉文学创作的重要资源,更是其文学发展进程中关键的“催化剂”。通过持续、多样且深入的文本吸收与转化,朝鲜汉文散文在内容、形式、风格与情感等多个层面实现了质的飞跃,更加完善与成熟。

(二)提升了朝鲜汉文散文的中国文化内涵与哲学深度,使其更具典雅性、理趣性、思辨性

苏轼诗文本身融汇了丰富而复杂的儒、释、道三家思想文化,承载着宋代士大夫深厚的文化积淀与人生哲学。朝鲜汉文散文通过引入苏轼诗文也吸收了其所涉各家思想和文化,如柳成龙(1542—1607)《备边杂录·军兵》说:“苏东坡以为‘虽圣人复起,不能易’,其说是矣。”^② 此说出自苏轼《论封建》,肯定了柳宗元“封建非圣人意也”^③ 的观点。柳成龙在此赞同苏轼观点,这也增加了他这篇文章的儒家思想文化内涵。徐赞奎(1825—1905)在《东溪游记》中先是记述了重阳节与友人游赏东溪美景的美好场景,然后慨叹:“噫!地不自胜,待人而胜。使东溪不遇两先生,则寂寞泓渟,湮没于空山荒僻之滨,谁复景仰之者? 挹先贤之遗馥,感后生其兴怀。溪山物色,古今无改,而吾侪今日之迹,便同雪泥鸿爪,后有何人,亦犹今之慕古

①[朝]金履万:《鹤皋集》,韩国古典翻译院编:《韩国文集丛刊续集》第65辑,首尔:景仁文化社,2008年,第56页。

②[朝]柳成龙:《西厓集》,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52辑,首尔:景仁文化社,1990年,第475页。

③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一九五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90册,第122页。

耶?……禹君汝七嘱余记其事。余不辞而诺之。归而搦管。如隔前尘而说梦幻事也。”^①“雪泥鸿爪”出自苏轼诗歌《和子由浥池怀旧》，苏轼告诉我们，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在瞬息变化，不会永恒。这体现了佛教之“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一切皆空”等思想。结合《东溪游记》全文以及结尾“如隔前尘而说梦幻事也”（像是隔着一层过去的虚幻影像，在诉说一件如同梦境般不真实的事情）可知，本文鲜明体现了佛教思想。黄廷彧的《桂影堂记》引用了《前赤壁赋》中经典的一段：“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乃以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有耳目者得而遇之，则为声为色。各随其自然，此固与物无竞，与众共乐之心也。”^②这也是对道家“无为”与“顺其自然”思想的接受。朝鲜文人对融入各家思想哲学的苏轼诗文的引入与追摹，使自己的散文也熔铸了各家思想，他们的散文瞬间被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纵深感。这种创作行为，不仅显示了作者博雅的学识，更使其散文散发出一种含蓄蕴藉、典雅精致的文化气质，将朝鲜汉文散文的整体格调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苏轼的一大贡献在于将深刻的哲理思考与生动的文学意象完美结合，创造出一种充满“理趣”的美学风格。朝鲜文人对“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等诗文的引用，也增加了散文说理的成分，说理却不枯燥，反而增加了一些趣味性。此外，朝鲜文人在引苏轼诗文的过程中，也将其中所蕴含的天人观、时空意识、生命哲学、处世态度纳入自己的作品之中，使其散文体现出浓重的思辨色彩。

（三）促进了苏轼及其诗文在朝鲜政治、教育、哲学等多个领域的广泛传播和影响，提升了苏轼在东亚汉文化圈的地位，并加速了其诗文的域外经典化进程

经过长期而深入的传播与接受，苏轼诗文在朝鲜半岛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越了纯文学的范畴，延伸至思想文化、社会制度乃至价值观念层面。朝鲜的汉文散文，作为当时主流的知识载体和表达工具，不仅是士大夫阶层议政、治国、论学与日常交流的核心文体，更成为他们构建话语体系、传递价值理念的重要媒介。当苏轼的政治主张、哲学观念与文学语句频繁出现在朝鲜文人的奏疏、书信、策论乃至科举文章中时，苏轼已从文学偶像成为了一种高层次的思想资源和文化符号。他的政治理念——如宽简为民、审慎变法，其哲学态度——如超然达观、融合儒释道，其教育思想——如强调博通与实用，都通过汉文散文这一渠道，深度渗透到朝鲜的政治决策、学术论辩与人才培养体系之中。可以说，朝鲜汉文散文成了苏轼思想在域外传播的“扩音器”和“中转站”，使其影响力持续放大。

与此同时，苏轼之文学巨匠的地位，也借助这样一种跨民族、跨语境的接受与认可，进一步巩固。朝鲜文坛持续数百年、自上而下的“崇苏”风气，以及李奎报、李滉、申纬等一流文人在创作中对苏轼诗文的引用追摹与精神承袭，从域外视角强有力地证明了苏轼文学所具有的普世价值与超越时空的不朽魅力。这使得苏轼逐渐从一位中国的杰出文豪，跃升为整个东亚文化圈共同推崇的文学典范，也实质性地推动了苏轼诗文在域外的经典化进程。经典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动态的、不断被阐释、模仿和再创造的文化积累过程。朝鲜文人通过持续的吸收、诠释与创造性转化，将苏轼的诗文深深嵌入汉文化圈的共同文本中，使其成为士人教养与文化认同的核心组成部分。这一经典化过程不仅发生在朝鲜，其影响也进一步辐射至日本、越南等其他汉文化区域，从而共同塑造并巩固了苏轼在东亚范围内崇高而持久的文化形象。

余 论

值得注意的是，朝鲜朝一些正统文人在肯定苏轼创作的同时也对其有负面评价，如《金宇颢年谱》载：金宇颢（1540—1603）在入侍昼讲时说：“苏轼文章伟丽，然其心术不正。故其书有矜豪谲诡之态，非知道君子所欲观，朱子详论之矣。雕虫小儒，图取科目，往往看之。若学道之人，耽看此书，岂不害其性情？况人主尤当非礼勿视勿听，所看书，尤须有益身心底事，何可效此雕虫小儒乎？”^③究其原因，一方面，苏轼

①[朝]徐赞奎：《临斋集》，韩国古典翻译院编：《韩国文集丛刊续集》第139辑，首尔：景仁文化社，2009年，第516页。

②[朝]黄廷彧：《芝川集》，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41辑，首尔：景仁文化社，1989年，第465页。

③[朝]金宇颢：《东冈集》，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50辑，首尔：景仁文化社，1990年，第497页。

之学与程朱理学在文道、修养等多方面存在根本分歧，随着程朱理学在朝鲜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因苏轼与程氏的分歧，故被斥责。另一方面，苏轼的崇佛向道思想与朝鲜的正统思想相违背，也被指为思想不纯正。^①

此方面的负面评价对朝鲜文学上接受苏轼之影响并不大。故从整体上看，朝鲜汉文散文创作对苏轼诗文的引用和追摹，不仅滋养了朝鲜汉文学本身，使其内容、形式、情感与内涵得以丰赡和深化，也反过来塑造了苏轼的域外形象，极大地促进了其文学与思想的传播，为苏轼在东亚汉文化圈内奠定其无可动摇的经典地位贡献了至关重要的“朝鲜力量”。这一段文学因缘，是中华文化影响深远与朝鲜文化善于吸纳创新的共同结果，也是东亚文明互鉴、共享共荣的经典例证。

Quotation and Imitation: a Study of the Reception of Su Shi's Poetry and Prose in Korean Classical Chinese Prose

CAO Chun-ru, ZHAO Teng-fei

(School of Literature,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273165, China)

Abstract: As a cultural giant of the Song dynasty, Su Shi's renown and selected works had already reached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garnered significant attention before he turned forty. His numerous celebrated poems and prose pieces were continuously discussed, quoted, imitated, and reworked within the classical Chinese prose of both the Goryeo and Joseon dynasties. Korean literati extolled Su Shi's "extraordinary talent and lofty character", declaring "none surpassed the Master of Po" (Po Weng). Consequently, they widely emulated his creative approach: quoting his poetry in Chinese prose to evoke scenes and express sentiments, to articulate emotions through events, and to bolster arguments; they also emulated Su Shi's various prose forms, either imitating entire works or rewriting pieces under identical titles, with the *Rhapsody on the Red Cliff* being particularly favoured. Su Shi's poetry and prose not only enriched the corpus of Joseon Chinese prose, accelerating its development and maturation, but also elevated its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philosophical depth, rendering it more elegant, intellectually engaging, and speculative. Moreover, Su Shi's literary works spread widely across multiple domains in Joseon—including politics, education, and philosophy—exerting profound influence. This further cemented Su Shi's stature within East Asia's Chinese cultural sphere and propelled the process of canonising his poetry and prose beyond his homeland.

Keywords: Joseon Chinese prose; Su Shi's literary works; citation; imitation; reception

[责任编辑 唐音]

^① 曹春茹：《朝鲜文人对苏轼儒道释思想的接受与批判》，《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